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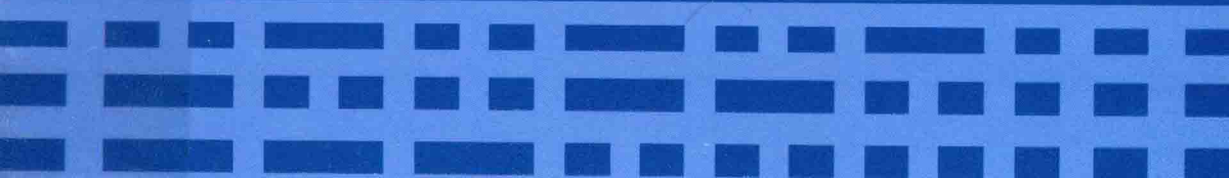
天人之学

——唐明邦自选集

唐明邦◎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天人之学

——唐明邦自选集

唐明邦◎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人之学:唐明邦自选集/唐明邦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17-1800-6

I. ①天…

II. ①唐…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7947 号



天人之学 唐明邦自选集

出版人 郑明清

责任编辑 朱珊 董巍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6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730千字

印张 42.25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9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郭齐勇

我的恩师唐明邦教授已届耄耋之年，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拟出版唐师自选集《天人之学》，弟子们听闻，欢欣不已。谨遵师命，作序于兹。

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工作，主讲中国哲学史、中国辩证法史、中国哲学文献、易学源流举要、道教文化研究等课程。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版学术著作十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在海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先生的主要著作有：《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邵雍评传》（附《陈抟评传》）、《李时珍评传》、《本草纲目导读》、《论道崇真集》、《周易通雅》、《易学与长江文化》（合著）等；主编有：《周易评注》、《周易纵横录》、《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等；参加撰写的著作有：《易学与管理》、《易学基础教程》、《中国哲学史》、《中国辩证法史稿》、《中国哲学史纲要》、《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等。

先生在明清之际哲学、中国辩证法史、周易哲学（象数与义理）、儒学、道家道教、佛学、古代科学技术哲学等领域，功底甚深，贡献卓著。本书集结了先生在以上领域的代表性论文，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窥见先生的学问规模与致思倾向。

在第一编“中国哲学举要”中，先生选录了他撰写的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哲学和有关“常”“变”范畴历史演变的论文。恩师萧蓬父先生与唐明邦先生都是明清之际哲学的研究专家。在著名哲学家、前校长李达先生的感召与安排下，他们二位都参加了1962年首次全国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及其筹备工作。在有关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中，萧唐二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961年底，唐先生还到衡阳实地踏访王船山的遗迹。唐先生在首次



全国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周易外传〉的若干辩证法思想》与《王船山史迹访问记》两文。20世纪80年代初，唐先生参加编写萧蓬父、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承担了明清之际部分的撰写任务。这一教材曾获前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印行十数万册，培养了两代学者。收入本书的有关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哲学的论文，主要是唐先生为这一教材撰写的相关内容，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唐先生有关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思考。唐先生努力抓住古代哲学家的主要范畴与命题，予以分析与现代诠释，这是理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进路。

在第二编“先贤的辩证思维传统”中，先生收录了他有关《周易》经传与兵家、农学、医学辩证法的数篇论文。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重要特色是辩证思维发达，在经、子之学与农学、医学传统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先生最近对我说，设置这一编，是想反映我们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点长期研究的一个重点，萧蓬父先生、李德永先生与他本人都曾在这一方面下过功夫。我们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作为发展观与思维方法论的辩证法，在中国学术史中尤为突出。中国的辩证智慧，不同于印度、希腊，而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表现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中国辩证法与社会生活及人生的关系特别密切。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有机性、相互联系性很强，其逻辑范畴与规律在不同哲学系统中所展示的形态尤为丰富。易家、兵家、农家、医家对辩证思维的发展都有不同的贡献。唐先生的这五篇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辩证法史的探讨。我认为，中国辩证法的探讨，在今天仍未过时，我们可以从中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特色。其中，天人关系，生命、生活与人生的辩证法尤为精彩。今天我们对生态环保哲学的思考，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辩证智慧。先生有专文讨论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为这一现代课题提供了古代人的智慧。

在第三编“人文易学之辉煌”中，先生收录了他有关《周易》义理的十篇代表性论文。唐先生是易学大家，对《周易》思想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在21世纪的意义作了十分详细的讨论与揭示，对《周易》中的中国管理智慧作了全面的梳理与提扬。先生深研长江文化与易学的关系，对杨万里、魏源的易学思想与今人的易学讨论亦有精到的点评。唐先生认为，《周易》乃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活水源头，《周易》经传启迪中华民族探赜索隐、极深研

几的哲学智慧，激励炎黄子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阐扬天下为公、万国咸宁的大同理想，培育独立不惧的人格精神和崇德广业的与世情怀。其太极思维方式、天人统一理论、保合太和思想，精深而高明，是先哲留下来的宝贵哲学遗产。先生认为，一部易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发展史。《周易》为锻炼民族思维能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典教材，又是经邦济世的宝典，使中华民族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面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总结过去，准确无误地策划当今，雄伟豪迈地开拓未来。其弥纶天地，经纬万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驾御中华巨觥，冲破重重险滩，绕过层层暗礁，乘风破浪，创造辉煌文明，使我泱泱中华，饱经沧桑而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崇德与广业并重，备物与聚人兼顾，自强与合众结合，进取与忧患同步的原则，至今有其实践意义与现代价值。

在第四编“象数易学之魅力”所收近十篇代表性论文中，先生对易学象数思维的特征、易图的思维方法论与模式予以揭示，对魏伯阳、陈抟、邵雍、朱震、来知德的象数易学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唐先生认为，象数思维方式为中国独创，绵延数千年，久而弥新。先生总结其特征为：以“取象比类”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对称、刚柔相济为致思原则，以整体思维为其合理内核，以强调序列与层次，注重节律为突出优点。唐先生指出，象数思维包含了、整合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是先哲智慧的结晶。易学史上出现过数千种易图，不少易图具有科学价值，蕴含着易学家的卓越智慧。先生认为，易图是中华民族传播信息的特殊方式，是象数思维方式的特殊载体。对于既有知识，它可将其作形式上的归纳，形成简约图式，利于触类旁通，开阔思路，拓展知识范围；对于未知领域，则通过易图的摹拟诱导，摆脱表面现象的局限，引发联想，启发新知，激发顿悟。在《周易》思想与易学史的研究中，唐先生着力打破义理与象数的壁垒，在义理与象数两方面都有建树，并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益于易学的创造性重建。

在第五编“儒学思想指要”中，先生系统地总结了儒家治国方略、经世理财思想、修身齐家之道，以“致中和”为《易》《庸》人生哲学的精髓，对孔子作《易》作出考释，弘扬民族精神与东方管理艺术。唐先生高度肯定儒家为中华民族提供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系统，培养与激励了历代志士仁人，凝聚了士子与民众，成为千百年来我们各民族的主要

信仰体系的基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信念与做人之道。他认为儒家“仁爱”思想的中心内涵是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指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大同”，这一理想指导人们建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通人和的和谐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亲如一家，并以宽广博大的胸怀，促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大同局面。儒家思想在承平时期能使人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在承平日久、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之日，能使人奋起改革社会，“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铁肩担道义，兴利除弊，拯救社稷；在外侮侵袭，国难当头之际，则抱负“多难兴邦”的宏愿，挺身而出，致命遂志，内除国贼，外抗强敌，救民于水火之中。儒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良心，使草根民间出来的君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担当起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豪迈气概与开拓精神。

在第六编“道家道教思想”中，先生收录的代表性论文，讨论了传世本与竹简本《老子》，重点阐释了道家、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与诸学、诸教的关系，论证了道家、道教直觉思维的长处，并对《道藏》作了多维度的解析，对老子、庄子哲学及吕洞宾、陈抟、丘处机思想作了深刻的探究。唐先生重点诠释了道家道教的四个方面的贡献：第一，《老子》、《庄子》中蕴含着精湛哲理，其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境界论有深刻意义。道家经典中原创的智慧，诱导人们玄思宇宙，深探神奥，站得高，看得远，领悟冲和闲静的宇宙本体，抛开世俗烦恼，虚怀若谷，气象恢弘。第二，道教应世接物，反映民间疾苦，同情劳苦大众：“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治大国若烹小鲜”。开导信众：“少思寡欲”，“复归于婴儿”，慈爱、节俭，净化心灵。其无为而治的政治论与返璞归真的人生论，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第三，道教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功劳卓著。外丹为古代化学、物理、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研究，洞开门户；内丹修持，为生命信息科学展示新途径。加之医药服食、养生方法的研究，成就斐然，名家辈出。第四，道家道教有助

于改善现代人生存的环境。它珍生戒杀，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以人灭天”，宣扬人为自然之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当回归自然，不应与之敌。这些思想对生态环保有积极意义。

在第七编“佛学浅悟”中，先生收录了他研究佛教哲学的五篇论文，涉及到佛学与易学互通的智旭与石头希迁等禅师的思想，天台宗哲学的主要观念，藏传佛教文化与新时期佛教教育问题等。唐先生十分重视曹洞宗巧妙结合佛《易》的理论与历史，认为曹洞宗涵摄易学，使自身的佛学思想有了特色，令人喜闻乐见，增强了理论性，提升了其在禅门的竞争力，不仅在中土枝繁叶茂，并能远播东洋。先生对藏传佛教独有慧心，他指出：“藏传佛教文化乃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分支。千余年来，它在世界屋脊珠峰之下生根开花，大放异彩。在藏传佛教影响下，西藏地区的天文、历法、医药、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等都有许多与汉地文化不同的特点。”藏文大藏经“是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的宝库。它蕴含着文法、诗歌、逻辑、美术、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多方面文化研究价值。”显然，唐先生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充分尊重多彩多姿的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各流派的文化，努力创造性地转化其精华，为建设现代化的伟业添砖加瓦。

在第八编“古代科技掠影”中，先生收录了他研究古代科技的五篇论文。唐先生十分重视对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他认为，《黄帝内经》与《周易》息息相通，阴阳五行思想是《内经》医学理论的基石，是传统医学、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周易》取象比类思维方法对中医学影响甚大，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阴阳调和的中和观，“天地节而四时成”的节律观，“唯变所适”“变而不失其常”的常变观，这些易学基本思想，都影响了并成为《内经》的基本理论。先生认为，《周易》象数与古代科技有密切关联，古天文学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的周期，古地理学借象数标志分野座标系统，古物候学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内丹、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乐律学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以致明清之际接受西方科学思想的方以智、徐光启等，试图改造发展《周易》象数思维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体系。唐先生撰《李时珍评传》，与医药学家的视角有所不同，力图从多学科、多角度阐发《本草纲目》的文化价值，除表彰其在创建本草学新体系，厘定本草分类新方法，发明新药物，丰富药性，增广百病主治药等方面的贡献外，还特别论述此书对研究植物

学、动物学、矿物学、农林牧渔以及历史文学的重要参考价值。唐先生还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探讨李时珍勇攀科学高峰的秘密，认为其独创精神基于他富有辩证的思维方法、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万物化生源于元气的自然哲学等。

唐老在《周易》哲学、道家道教哲学、古代科技哲学三个领域中极深研几，创获尤多，贡献甚大，蜚声中外，是我国在这三个领域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学者。不仅如此，他老人家在明清哲学、中国辩证法史、儒学、佛学等领域都有甚深造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老对整个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史的各方面、各断代都有深入研究。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唐老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创见，尤其是他老人家真正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精髓，并善于平实、准确地表达出来。

六十多年以来，唐老勤于读书、思考、著述与讲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献身祖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事业，为现代化文教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息！他晚年一再申言，要“重振国学，复兴儒学，弘扬易学，光大祖国传统文化，中西融合，古今贯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他的为学主旨，也是他的心声与宏愿，并念兹在兹，身体力行！

唐老为人谦和，清退不争，胸怀坦荡，乐天无忧，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谨遵道家养生要诀：养性贵守和，炼身贵守恒，饮食贵守淡，起居贵守时。老人家精神矍铄，步履矫健，声若洪钟。他即将迎来米寿、九十、百寿与茶寿等，门生故旧衷心地恭祝老师与师母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晚生郭齐勇序于壬辰年盛夏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编 中国哲学举要	(10)
中国古代哲学的璀璨高峰——王夫之哲学思想	(10)
破块启蒙的历史哲学——黄宗羲思想的卓越贡献	(42)
大气磅礴的自然哲学——方以智哲学的历史功绩	(56)
“常”、“变”范畴的历史演变	(75)
第二编 先贤的辩证思维传统	(96)
《易经》卦爻辞中的辩证思维	(96)
《易传》的辩证法思想	(108)
《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的辩证思维	(121)
《吕氏春秋·尚农》的农学辩证智慧	(136)
《黄帝内经·素问》的医学辩证智慧	(149)
第三编 人文易学之辉煌	(165)
《周易》思想的核心价值	(165)
《周易》与 21 世纪	(167)
《周易》论和谐	(175)
我的《周易》价值观	(181)
群星璀璨的长江易学概述	(191)
《周易》——中国管理思想的源泉	(203)
弘扬易学 振兴中华——魏源《默觚》的易学思想	(230)



忧国忧民 敬德力行——杨万里《诚斋易传》易学思想 (239)

《易经》——上古巫史文化之汇萃 (249)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易》坛回眸 (257)

第四编 象数易学之魅力 (267)

易学象数思维的基本特征 (267)

易图的思维方法和认识价值 (280)

先天易学思维模式举要 (287)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与易象 (300)

陈抟传授的《先天图》和《易龙图》 (309)

别开生面的帝王王伯历史观——邵雍的先天象数易学思想 (324)

朱震《汉上易传》对象数易学的贡献 (335)

来知德的“唯象易学”新体系 (347)

历代易图选粹 (358)

第五编 儒学思想指要 (391)

儒家治国方略浅析 (391)

儒家经世理财思想 (399)

儒家论修身齐家之道 (406)

“致中和”乃《易》、《庸》人生哲学之精髓 (413)

孔子作《易》考 (418)

振奋民族精神,重光东方管理艺术 (428)

第六编 道家道教思想 (433)

老子、《道德经》与道教 (433)

道家、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451)

道家、道教注重直觉思维之真谛 (464)

《道藏》文化价值的多棱透视 (473)

楚墓竹简《老子》剖析 (485)

老子尊道贵德尚和的“玄同”愿景 (495)

庄子“法天贵真”的人生哲学	(500)
纯阳帝君与陈抟老祖	(506)
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弘道精神	(519)
第七编 佛学浅悟	(534)
以佛解《易》援儒证佛——读智旭禅师的《周易禅解》	(534)
曹洞禅理与《周易》——石头希迁禅师的禅学法脉	(546)
天台宗“三谛圆融”与中道观	(556)
藏传佛教文化乃东方“摩尼之宝”	(559)
巍隆大道,恢弘如来家业——新时期佛教教育刍议	(567)
第八编 古代科技掠影	(575)
周易象数与古代科学	(575)
道教金丹术及其科学价值	(595)
道教养生法则与古天文	(604)
医中之圣李时珍	(610)
李时珍论医论药的科学思维方法	(622)
附 录	(650)
唐明邦教授简历	(650)
唐明邦教授学行编年	(651)
唐明邦学术著作要目	(658)
后 记	(660)

绪 论

天人之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突出地位。数千年来，经史百家，无不卷入天人问题的争论，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研究天人之学对于化解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开拓宽广的科学视野，实现“以人造天”宏愿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乃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论题

天人关系问题的提出，可追溯到五千年前。古史传说，人文始祖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首画八卦，以尽天人之蕴，以类万物之情。公元2500年前，《周易·系辞传》首先阐发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宜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震古灼今的“天人之际三纲领”。将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尽人事的人类思维向度作了言简意赅的精确概述。从此，天人关系的论题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经史百家无不阐述各自的观点，自明其是。《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尚书·洪范》：“天乃命文王亶壹戎殷。”《左传·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上古经典异口同声宣称“天”是超越自然的人格神，天子、庶民无不奉“天命”而生，遵“天命”行事。

不难看出远古时代的天人关系，主要讲人同天神的关系，认为尧舜禹汤等人物，都是上天特意安排的圣君，尽管这同后世天人之辩的内容大异其趣，但“天命”论思想，垂数千年未曾熄灭，的确关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二、天人之辩的历史演变

进入封建社会，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人类智慧的增长，天人问题，不再限于人神关系，进而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个人与国家君权的关系，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这一辩论，贯串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大体

经历三大历史阶段。

春秋战国以降的先秦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虽作为人格神的“天”还依然保持其神气，思想家们已不受其桎梏，迸发出新的“天道”观。首先，《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为邦本”的主张，否定“天命”对政治兴替的决定作用。政治家管仲答齐桓公，明言“王者以民为天”。这一思想影响至为深远。儒家创始人孔子，尽管还强调“畏天命”，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对于自然之天已有明白论述，告诫弟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指明天无意志，四时行百物生乃自然而然。孟子亦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胆言论；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天与人孰轻孰重阐述明白。道家创始者老子，一方面也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仿佛人格神的天依旧在观察下民的善恶，但他的基本思想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天地人均顺道而行，一切当听其自然。庄子讲的更明白：“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无以人灭天”。

战国后期的荀子，鉴于孟子重人不重天，庄子重天不重人，在《荀子·天论》中，首先提出当“明于天人之分”，天与人各有其功能，进一步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有着客观的运行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指出人之于天不是无可作为，应当奉行天之“常”即客观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利用自然之天以造福人民。荀子在天人关系上的正确思想，实乃总结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战天斗地的实践经验而来。不难发现，当时的兵家、农家、医家，对天人问题都有不少光辉思想。《孙子兵法》主张，进行战争，既要“知彼知己”，同时还应“知天知地。”他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九变》）。在战略战术的抉择上，都应正确考虑天人关系。《吕氏春秋·尚农》诸篇，主张要获得农业丰收，必须善于“审时”，掌握好农事活动季节；同时善于“辨土”，区分土地的高下、肥瘦；还要善于“任地”，看准不同的土地适于种植何种庄稼，实即将正确处理天人关系问题贯彻于农业生产全过程。《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教人在日常生活中，当注重天人关系进行自我保健：“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起居有常，饮食有节，不妄作劳”，乃可长命百岁。《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无疑是对先秦天人之辩的正确总结，将天人问题引向科学发展的正确轨道，在天人之辩中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

两汉至隋唐时期，天人之辩进入新阶段。先是汉代谶纬神学盛行，董仲舒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垂问，迎合武帝意向，大肆宣扬“天人感应论”，主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巩固封建统治出谋献策。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根据《易》、《老》、《庄》三玄思想，崇有论者与贵无论者争论不休。崇尚玄虚之论，力图抹煞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隋唐时期，道教与佛教盛行，社会上热衷于玄虚与空无的宗教以及儒家宣扬的道统论，迫使天人之辩进入新阶段，采取了新形式。

首先汉代思想家王充，撰《论衡》一书，宣扬“元气自然论”，予“天人感应论”以猛烈抨击。主张：“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晋代思想家杨泉，发表《物理论》，大张“元气”学说，写道：“夫天，元气也。”“元气皓大，则称皓天。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对“天人感应论”所树立的能赏善罚恶的人格神予以彻底否定。唐代著名思想家刘禹锡，写了洋洋洒洒三篇《天论》，予汉唐以来谶纬神学和道教佛教在天人问题上所宣扬的超凡脱俗的玄虚空无之论予以彻底清算。《天论上》首先指出：天与人各有所能，“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又说：“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中》说：“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在佛道宗教气氛隆盛之际，异军突起，撑起“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鲜明旗帜。把人们的思想从玄学家与佛祖、老君那里拉了回来，教人真心实意正确面对大自然和人世社会问题，实现人类思想从玄虚空谈或神学迷雾中获得又一次解放。

树欲静而风不止。宋明时期，天人问题在新的思想形式下展开激烈争辩。宋明道学家提出“天理”范畴，掀起天人之辩的新浪潮。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空谈天理，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主张：“理在物之先”，具有永恒性，“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他们的宗旨在诱导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朱子主张：“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无非要求人人遵守所谓的“天理”，实指残酷的封建王法；而极端压抑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大肆宣扬“心外无物论”。陆九渊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此

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只要人们“去人欲”，便可“复天理”，这就叫做“致良知”。理学派与心学派，虽相互争论，实则二者同样在诱导人们确守王道，压制人欲，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无上权威。

宋明时期进步思想家，张载、王安石、李贽、唐甄、王夫之等，认为理学、心学流毒社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极大思想障碍。北宋徽钦二宗的被俘、亡国，南宋朝廷醉心于西湖歌舞，“直把杭州做汴州”，实为理学心学大倡“存天理灭人欲”，倒行逆施，祸国殃民所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奋起反击，力图扭转乾坤。李贽的《焚书》、《藏书》，唐甄的《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周易外传》都是申讨封建王权的檄文。王夫之的思想最为激烈，理论最深刻，他开宗明义写道：“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①，反对“离欲而别为理”。他斩钉截铁地宣称：“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他更由社会领域的天人之辩，转向自然领域的天人之辩。在《周易外传》中，阐发“贞常制变，延天佑人”的光辉思想，高举“以人造天”的思想旗帜，将天人之辩引向高峰，成为数千年来天人之论的最强音。写道：“天之所死，犹当生之；天之所愚，犹当哲之；天之所无，犹当有之；天之所乱，犹当治之。任天而无能为，何以为人！”^②以人造天之论，振聋发聩，为三千年来的天人之辩，作了最高的理论总结、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直到如今，依然放射璀璨的光辉。

三、实现“以人造天”理想的先行步骤

不难看出天人关系问题的争论，绵延数千年，贯通于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所谓“天”，不外三重含义，一是指“天神”，即超自然的人格神，其危害是将人引入迷信神灵的宿命论。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智慧的提高，“天命”论的市场已日益缩小，至今仍有其残余。二是指自然之“天”，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鸟兽无所不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见时间，必须认真对待的自在之物。三是指抽象的“天理”之天，实指儒学所说的“皇极”，制约人们思想言行的王道纲常，封建名教的权威。

古之先哲千言万语，告诫人们必须正确对待“自然之天”，遵从《周易》的旨趣，“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首须在“知天”、“顺天”、“参天”三大方

①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② 《周易外传·系辞上》第九章。

面多下工夫，然后才能取得“以人造天”的辉煌成果。

知天——认知“天行有常”、天人合一。“天”指自然界，没有意志，有其客观运行规律。荀况曾明确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的运行常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不会因为尧为圣人就为之运转，桀为昏君就不为之动转。认知“天行有常”，旨在尊重自然规律，依据自然规律行事。《周易》主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执政当局当依据时变，“敬授民时”，即颁授“历法”，以便天下遵行，以免违背农时。对黎民来说，《黄帝内经·素问》指出：“法于阴阳，合于术数。”此乃养生之道。传统文化主张，不只“知天”，同时还要“知人”，明确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周易·序卦》写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是说，先有自然发展史，然后才有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从自然界产生，本属自然界的一部分，应如爱护母亲一样爱护大自然，绝不可颠倒关系，胆大妄为。“知天”的目的正在于不可将“万物之灵的”人类凌驾于生我养我的自然之上，坚决抛弃人类中心主义。

顺天——顺应自然、“自求多福”。《周易》主张，人与自然相处，理当“顺天休命”，即顺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完美（休）自己的人生（命）。写道“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①人当合乎天地之德，长养万物；合乎日月之明，普照万物；合乎四时之序，不可紊乱。这里说的“鬼神”，指阴阳二气的归（鬼）、伸（神），人当与之同步，乃能自求多福。自然法则，从之则吉，违之必凶。以上说明的是“天道”。地道亦然，地理环境亦有其客观规定性，人必从之。《黄帝内经·素问》描述颇为周详：“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故其病皆痼疡……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风冽，其民野处而乱食，藏寒生满病。”^②这都说明地理环境不同，食物，居处有别，灾病多异。养生、诊病，治病，各有所宜，不可违犯。

古人营造居室，从来会全面考虑自然环境的特点，“顺乎天而应乎人”，巧加布置，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对中国人的生活环境

① 《周易·文言》。

② 《内经·素问·异法主宜论》。